

政府采购不能让企业“自证清白”

据报道,从今年起,报名参与广州市政府采购,供应商须提供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这一证明由当地检察机关出具。

近年来,上海、山东、江苏等很多地方都先后出台了类似政策。广州此举,也是因为此前广东省出台了这样的政策要求。网络搜索结果显示,为参加政府采购的企业代开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业已成为一项公开的业务,大有演变为产业之势。

应该说,诸多地方政府让参与政府采购的供应商提供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动机是好的,初衷大多是想借此增加一道防止腐败的制度门槛。

但是,从常识来说,无论是公权力还是私权力均没有权力要求他人自证清白。在政府采购领域,如对企业资质,以及有无行贿经历存疑,也只能是由政府来进行资格审查,而不是让企业来自证清白。否则,此举在本质上,是责任倒置,将反腐败的责任推给了企业和社会。

政府可以有道德洁癖,但应致力于通过制度建设来防止腐败。需要明确的是,各种腐败行为的发生,责任大多在权力运行不公开、不透明,不受约束,缺乏监督。政府采购腐败高发,多数因为各种暗箱操作,以及监督乏力。因此,防止政府采购腐败的制度设计,应明确政府责任,强化对权力的监督,而不是将部分责任推到供应商的头上。

事实上,正如同没有一个公民有责任和义

务自证清白一样,企业公民也没有责任开具这样一份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企业有无犯罪记录,都在政府那里,一查便知,何必多此一举?同时,这也是对供应商权利的不尊重,将它们假定为犯罪嫌疑对象,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也正是因为此,这一制度几近形同虚设。一些企业既可以行贿检察机关而开出“清白”证明,一些企业也可以通过注册新公司,或借助子公司而绕开这一政策。当然,大量的行贿、腐败行为是秘密进行的,并没有被发现,这一制度也并不能阻止官商勾结,运作中标。而这陡然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甚至增加了权力寻租的机会。

遏制政府采购腐败不是让企业、供应商去做什么,而是怎样去约束公权力,让政府采购更加公开、透明,更加具有竞争性。近年来,天价采购屡屡出现,有的地方买个U盘都需要数千元。这背后的责任在供应商吗?

政府采购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如何降低采购成本,让每一笔政府采购都在阳光下运行,对每一笔政府采购进行监督核查,对每一个投诉都依法进行调查,让每一笔政府采购都接受民众的监督。这些才是更加应该去做的事情。

因此,最值得警惕的,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只是让供应商自证清白,而淡化乃至放弃了资格审查、把关,也不去真正履行监督职责,那么,这样的制度就不过是应付上级的“花瓶”,只是一种反腐的摆设。

(转载自《新京报》)



人情成“债”

□ 文/奚旭初 图/赵顺清

该给谁红包?红包里要包多少钱?收了人家的红包怎么还?每到春节,对一部分人群来讲,上述问题成为压在心头的“三座大山”。“我去年春节后一共买了5扎共50个红包,到现在只剩下4个了。”2月14日,家住武昌的白领陈小姐向记者感叹,过去一年用掉了46个红包,想来有些恐怖。

花钱如流水,春节变“春劫”,过年真不易。因过年而“叫苦不迭”,主要是因为人情“压力山大”。长辈、晚辈都要给红包,走亲戚要带礼品,同学聚会,请客吃饭……举手投足离不开人情二字。当然不能简单地给人情下一个“好”或“不好”的结论。重人情,尚礼仪,礼尚往来,传递情谊,本是我们一个淳朴的传统。然而,当人情变成了“债”,不见了人情只剩下“红色”的时

候,又还有多少意义?

人情成“债”,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场景,而到了过年时候,这情形就更是得以凸现。“面子文化”在春节的集中爆发,再次反映了“人情债”正在变成人际关系中的难以承受之重。

在“人情债”面前,无法简单地划分出谁是害人者、谁是受害者,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情债”之所以泛滥之所以成灾,恰是因为你、我、他都曾经或者还在为其推波助澜。因此清除“公害”,还须依靠:你、我、他。

人情异化,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是这些年来,社会上滋生出了一股奢靡之气。炫富摆阔,把穷奢极欲与面子划上等号。因为靡费之风侵蚀,亲情人情变得势利。公款吃喝等“官员经济”得到明显遏制,必将引领社会风气激浊扬清,人情正本清源,过年不再难,也是理所当然,可以期待的。

“学习粉丝团”去留何以那么“敏感”

□ 陶短房

据报道,因大量发布和国家领导人行程起居有关的信息,且不少信息事后被证明颇有“命中率”的微博ID“学习粉丝团”,在春节期间玩了把“谢幕返场”:2月11日10点47分发帖“再见”,2月12日10点47发帖回归,从“谢幕”到“返场”,间隔不足24小时。

按照“学习粉丝团”自己的解释,他当初选择“再见”,是担心“国民现有认知容不下我们”、“现实环境容不下我们”。但“再见”帖中充满煽情语句,又留下“私扣”这根若有若无的“尾巴”,隐隐让人感到“想说再见不容易”。不到一天后不动声色地“返场”,更让许多观察者产生更多想法。一些人索性直截了当地认为,这个ID的欲去还留,不过是意在骗粉的营销俗套罢了。

尽管“学习粉丝团”在最受关注、争议最激烈的几天里,陆续公布了许多翔实的个人信息,力图证明自己已是“普通人”,是“真实人”,是“草根”,但争议并未就此远去。

网络时代有网络时代的规则,网络交际平台更有网络交际平台的“通用语言”。就这方面讲,“学习粉丝团”的“一去一回”并无违反规矩之处,可以不喜欢,却没理由反对。不论当初或

现在,这个ID至少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用网络和微博的规则,和喜欢与不喜欢他的众多网民互动,并没有用“超规则”或“潜规则”的手段不当放大自己的声音,或不当屏蔽针对自己的不同声音。

网络交流需要粉丝是正常的,从这点讲,即便“学习粉丝团”的确是在炒作、在营销,也无可厚非。毕竟这不是强买强卖,你我可以买,也可以不买,可以关注,也可以不关注。不过粉丝需要,学习更需要,这不仅是针对“学习粉丝团”,也是针对所有网络平台上的言者、听者。如何学会在网络时代筛选与传播信息,如何运用网络平台工具和规则,与他人实现良好互动和正常交际,如何对待“粉丝”和异己,这些都是亟待学习、掌握的新生事物。

“学习粉丝团”的一走一回引发如此多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政治、对政策走向、对政府和领导人动态的关注。当代社会和网络时代,政治和民众的互动理应更公开、直接、透明和频繁,而网络则是实现这种互动的理想平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如能实现政治和民众更常态化、更良性的互动,“学习粉丝团”便“脱敏”有望,一言一行,也无需像今天这般被几十万“粉丝”全方位“监视审查”了。

摔跤出局 运动员咋办

□ 厉衍飞

日前,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经过多轮投票,决定将摔跤项目剔除出2020年夏季奥运会。虽然摔跤还有和棒球、空手道、轮滑、攀岩、壁球、滑水、武术等7个项目竞争一个临时奥运席位的机会,但能够重新挤进奥运会的希望非常渺茫。

摔跤项目“摔”出奥运会,不少业内人士开始对国内摔跤运动员目前的境况以及退役后的前景担忧。其实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奥运奖牌几乎成为竞技体育的“指挥棒”,能否存在奥运会上大家庭,对运动项目的开展和公众关注度都有着不小的影响。2012年伦敦奥运会出局的棒球和垒球就是一个例子,这两个项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很难再吸引公众的关注,而各地方队的主要任务也只剩下全运会。

如果摔跤项目在奥运会出局,一些地方摔跤队也许会面临被“砍”的危险,部分摔跤运动员或许要面临转型或退役的选择。生存环境的变化,肯定会影响摔跤运动员未来发展,运动

员的前途也就不得不让人担忧。近年来,运动员退役后生活窘迫的新闻屡见不鲜:举重运动员邹春兰当搓澡工度日、田径运动员郭萍卖金牌治病、体操运动员张尚武卖艺乞讨……这些不断被媒体爆出的退役运动员生活窘境,加深了人们对摔跤运动员前景的忧虑。

在奥运会项目不断调整的前提下,若不幸在竞争临时奥运席位中再次失利,摔跤不会是第一个被“踢”出奥运会的项目,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如果我国的竞技体育布局因奥运设项变化而变,则无法形成项目本身符合市场规律的良性发展,这也是造成棒球、垒球等被迫从奥运项目转为非奥运项目之后处于尴尬境地的主要原因。如何保障这些项目运动员的利益,帮助他们完成转型或退役的蜕变,这是体育管理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和运动员自身的共同努力。建立健全运动员特别是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教育、医疗和就业技能等多方面的保障,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运动员自己也应该对未来有所规划,而不能光指望社会大包大揽。

对伍皓“微改革”不必求全责备

□ 徐立凡

2月10日,云南红河州委宣传部官方微博爆出“猛料”,公布了红河州委宣传部长伍皓的公车牌号“云G99099”。伍皓证实,他主动要求公布了他的公车车牌号,“禁止公车私用从我做起,求大家监督我”。

伍皓自曝公车牌号,立刻成为舆论焦点。很多人叫好,也有很多人质疑。其中最大的质疑是:作为副厅级官员,伍皓没资格享有专车待遇。日前,伍皓专门作出回应称,不是“专车”是“公车”。他同时表示:主动公布车牌是“微改革”。如果全国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都能坚持“微改革”,就可能汇成改革的最强音。

公车私用,是久治不愈的顽疾。自上而下的公车管理制度和改革,时常遭遇自下而上的“软抵抗”,要么形同虚设,要么无疾而终。社会公众,仍在翘首以待。现实条件下,公车改革能否积滴水为大川,形成不可逆之势,进而带动三公消费改革的破局,官员的自觉配合起着重要作用。毕竟,在政府主导式改革中,官员的态度和立场是重要矢量,既可能影响改革的方向,也会影响改革的成本。伍皓主动公布车牌之举,既与治理三公消费方向一致,又与公众愿望合拍,理应认同。如同此前

不少官员表示愿意公开财产一样,这样的愿望,都应该成为破冰正能量集聚的开端,而不是套用理论上的正义求全责备。

其实,伍皓自曝车牌,与此前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试验一样,都表明了体制内呼应改革的愿望。个人愿望固然单薄,但也表达了一种立场。这种立场表明,公车改革存在社会愿望与体制愿望的交集点,这种交集是一项系统性改革必须具备的前提。有了这个交集,才可能有稳妥而高质量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不应是高高在上的文本设置,而应具有接地气并能得到响应的现实底色。

从这个角度说,伍皓是不是有资格坐专车,是否把公车当专车用,并非关键所在。涉及体制层面的系统性改革,都不是实验室实验。实验室实验,可以追求高标准的纯净的实验环境,而公车改革,说到底还是官场利益和官场惯性的重新调整和适应,求全责备,只会分流主动改革的意愿,造成改革成本的增大,而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改进。

在一般概念里,恶猜公权,固然可称作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思维前提,但是,不能恶猜那些愿意改革之举,无论是叫“微改革”还是其他。即使这种举动不那么完满,却也是值得呵护的萌芽。